

## 也谈社会科学研究中

### 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

--读加加美光行教授“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

武汉大学 周长城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加加美光行教授是我见到的少有对中国学研究这么感兴趣并倾注自己毕生精力的外国学者。尤其是加加美光行教授 2006 年发表的《现代中国学原论》和 2007 年的《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两篇文章，对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重要的是批判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将西方置于近现代科学的主体地位，将东方置于客体地位的“东方主义”的世界认识观点。加加美光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中国学研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正是基于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导致加加美光行教授最近倡导“国别研究”(nation studies)中的“共同态度性”(co-behaviorism)。

事实上，所谓“共同态度性”的三个前提，其本质上都表现为国别研究中的，或者更广泛意义上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讨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加加美光行教授是在与历史上的学人进一步对话。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的问

题也是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目的性（行为）的相互联动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主客体的目的性，正如加加美光行所指出的那样表现为“相互协调、相互结合”的态势，但他同时指出也表现为“相互对立”。这种“相互对立”在有些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表现的很明显。首先，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同，社会化因素的不同必然导致其与被研究对象这一客体（无论客体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集团）的不同看待事物的态度、视角和方法。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性决定了主客性在态度及目的上的差异性。当然，我们说主客体在互动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主体会受到客体的影响，同时，客体也会受到主体的影响，这是一个能动的过程。

加加美光行教授提出国别研究中的“去东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中国研究的情怀所致，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当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一倡导对国别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尽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东方主义”还有待观察。